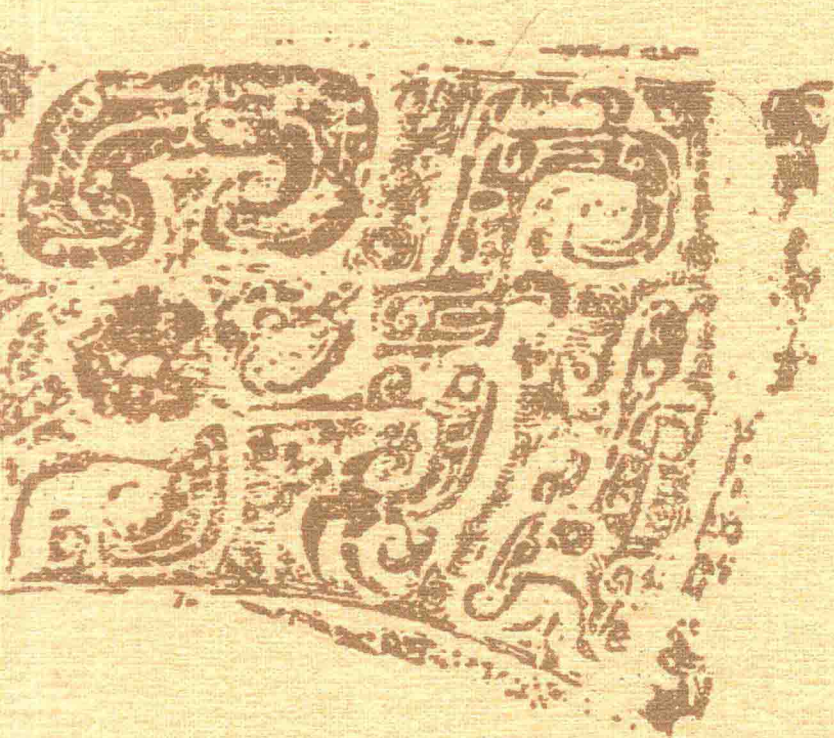


· 山东博物馆学术文库 ·

商周铜器与金文辑考

王恩田◎著



 文物出版社

山东博物馆学术文库

商周铜器与金文辑考

王恩田 著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商周铜器与金文辑考 / 王恩田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010 - 4732 - 1

I. ①商… II. ①王… III. ①青铜器 (考古) - 中国 - 商周时代 - 文集②青铜器 (考古) - 金文 - 中国 - 商周时代 - 文集 IV. ①K876.414 - 53②K877.3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1973 号

商周铜器与金文辑考

著 者: 王恩田

责任编辑: 贾东营

责任校对: 安艳娇

责任印制: 陈 杰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2.25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0 - 4732 - 1

定 价: 200.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序

本书是作者从1972年开始，至2015年以前研究商周青铜器与金文的论文结集。为了便于检索，把性质相近的文章编在一起，分为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是材料、年代和鉴别真伪，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首要条件。

《概述》一文收录铜器计16批184件。除山东博物馆的藏品外，大多是山东省出土文物展览中的展品。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黄县小刘庄出土的启尊、启卣，涉及周昭王伐楚的史实。烟台上夙器与己器共存于一墓，证明夙与己（纪国）为一国。临朐扬善出土的公孙灶壶（公子土父壶）器群提供了春秋晚期的一批标准器。诸城臧家庄战国铜器中的编铙、编钟，此后发现了铭文“陈翊立事岁，公孙潮子作器也”。陈翊即齐闵王所杀的齐国公室陈举。为战国晚期提供了一批标准器。

如下的四篇主要是讨论铜器年代的：

1. 关于西周铜器年代，唐兰先生曾利用“康宫”原则，成功地解决了武、成、康铜器与昭王铜器的断代问题。我进一步利用“成周”原则，解决了武成铜器与康王铜器的断代问题。并提出康王迁都成周的看法。

2. 关于断代工程的西周年表，不仅根据颍公簋的发现，成王年代需要作出调整，康、共、夷、孝、懿、厉等诸王年代也都需要作出调整。

3. 晋侯稣钟的年代有宣王说和厉王说之争，长期以来难以形成共识。《再说晋侯苏钟年代——兼论〈中国先秦史历表〉的校正》一文，例举大量证据，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证明宣王说应是可信的。晋侯稣钟记载的史实，即《周语》宣王东征伐鲁国。历史背景是鲁人杀懿公立伯御为君，破坏了一继一及的继承制度。稣钟年代之争涉及到历法与历表的矛盾。周历的置闰是根据物候的变化，而历表则是按十九年七闰的原则推算出来的，因此，周历和历表不合是正常现象。周历有时是应闰而不闰的失闰，或不应闰而闰的豫闰。因此，当器物年代与历表不合时，应采用历表的宽式使用法，即须提前一个月，或推后一个月看其是否相合。而不应使用建正游移说加以解释。建正游移说是未经验证，没有使用价值的纸上谈兵。比如第一年建子，第二年建丑，第三年再建子，则第二年只能有十一个月，足证其荒唐不可信据。

4. 山东列国林立，每个国家的铜器各具特色，都有自己发展演变的轨迹，应该分别建立各自的年代分期序列。《齐国东周铜器的年代与分期》一文，对齐国东周 10 类 254 件具有分期意义的礼器，分类排比，讨论其分期与年代。为齐国东周铜器树立了一个分期与年代的标尺。

第二单元是文字考释。文字考释是研究的基础。把字认错了，犹如大厦建在沙滩之上。

《释(自)、𠂔(官)、𠂔(师)》及其《补证》，对这三个长期以来被混淆的字加以区别。认为原被隶为自，读作师的𠂔，实为官字初文。官通馆，即客馆，备有粮草以接待过往宾客。卜辞“王作三𠂔右中左”即建造三座客馆。金文“西六𠂔”“成周八𠂔”即在周人故地和成周分别建造六座和八座客馆。客馆除接待宾客外，还可屯驻戍卒。郭沫若和徐中舒先生列举多项证据，不同意释𠂔为师。唐兰先生晚年也说“𠂔师有别，后世通用”。后世通用，实为后世混用。金文“六𠂔”，经籍作“六师”。金文“京𠂔”，经籍作“京师”，都是后世隶定时出现的讹误。否则金文有“西六𠂔”，经籍为什么只有“六师”，而没有西六师？更没有“成周八师”或“殷八师”？显然只能根据甲骨文、金文订正经籍的讹误，而不能本末倒置，以“后世混用”作为考释古文字的依据。

《微子封宋》两文中对长、微二字加以区别。长、微二字都像人披长发形，拄拐杖者为长，无拐杖者是头发之发的本字，音同借为微小和微妙的微。或借为魏国、魏姓的魏。纠正了《古玺文编》中只有三晋中的赵、韩二姓，而无魏姓的失误。河南鹿邑西周大墓墓主原被释为长幼之长的长字和长短之长的长字，实为微子封宋的“微子”。而且证实微子初封于今鹿邑的相，称相侯。昭王赐相侯望土以后才徙封于今商丘的宋国。

第三单元是族徽。

族徽是族的标志。两个以上的单体族徽组合在一起，可称“复合族徽”。复合族徽涉及族源和族与族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金文编·附录上》所著录的都是单体族徽和 65 组复合族徽。其中的第 47 组是包括八九种族徽所组成的复合族徽。以往所说的“孤竹”，其实是第 47 组复合族徽中冉和智等两种单体族徽的误释。

卜辞中的“子×”和多子族复合族徽中的“子×”“子××”“子×××”中的“子”，既不是子孙的“子”，也不是“王子”，而是殷人的姓。来源于殷人始祖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的感生神话。卵与子同物而异名。“多子族”是众多子族的集合称谓，相当于部落。

“周”字初文像双手向田间撒播种子。商代周人的族徽作𠂔(𠂔)、𠂔(田)，西周的周人族徽作𠂔(田)。周人有始祖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弃的感生神话，于是产生了“足迹形”和“止”字族徽，音同借为姬。周人刘氏、单氏、荣氏等都有自己的族徽。

不仅姬姓周人使用族徽，任姓薛国、妨姓陈国，甚至浙江的越国也都使用族徽。对周字族徽居然不认识，对大量的周人族徽和殷人以外的诸多异姓的族徽视而不见，所提出的“族徽是殷人专利，周人不用族徽”说，其实是并没有对全部族徽加以整理、分析研究的庸浅之论。恰恰相反，殷墟出土的周字族徽和复合族徽证明商周同族，周源于商。考古学中的先周文化实为商文化西扩的产物。

1975年，岐山新出薛器中的史、薛复合族徽，说明史与薛同族，薛国是史族建立的国家。80年代滕州薛国故城前掌大史族墓地的发现与发掘证明拙说可信。

第四单元是古国和历史事件。大量考古发现提出许多重要的学术论点。

1. 纪、箕、莱为一国说：纪国为齐所逼“大去其国”，转移至黄县（今龙口市）、烟台、莱阳、海阳等胶东地区。齐灵公灭莱，实为灭纪（箕）。

2. 杞分二国说：西周分封的杞国，在今河南杞县。为避淮夷侵扰，齐桓公迁之于缘陵，今昌乐县。商代的杞国在今山东新泰，与鲁国有领土纠纷，为楚国所灭。史密簋中的“杞夷”即鲁国的使用夷礼为籍口所征伐的新秦杞国。

3. 兖州出土鬲器，证明鬲是帝辛十祀征夷方途径的地点和鲁分殷民六族中的索氏。

4. 晋侯墓地并非9对晋侯夫妻合葬墓，并穴合葬者应是兄昭弟穆的关系。晋侯墓地是18位晋侯的墓，年代最晚的M93是晋哀侯墓。羊舌墓地应是“九宗五正”诸族中一支的墓地。

5. 归父敦中的鲁子仲即东门襄仲。襄仲与其子归父都是鲁国政坛上实权派人物，是鲁国绝对年代可考的春秋中期晚段的标准器。《曲阜鲁国故城》甲组墓M202出土的Ⅱ式盆（图版肆拾捌：3）与归父敦和洛阳中州路M2415出土的敦形制完全相同，应是周人的典型器物。证明《曲阜鲁国故城》发掘报告把甲组墓定为夷人墓，是完全错误的。

6. 根据《竹书纪年》“二王并立”的记载，证明三门峡虢国的建立，是在晋文侯二十一年（周平王十一年，前760年）杀幽王之子携王余臣，结束了“二王并立”的局面以后才建国的。并根据小子吉父鬲，结合文献记载，提出一号虢季大墓墓主是虢公忌父，九号虢仲大墓墓主是虢仲林父。

7. 高青陈庄西周遗址是山东周代考古空前的重大发现。台基平面中心为圆圈，其外为方圈和不同形状的九个圈相套，剖面是由九层颜色不同的灰土夯筑而成。台基下埋有一个小动物，应是《楚辞·天问》“圜则九重”所说象征天有九层的天体模型，其功能是祭天。西周称为“天位”，战国以后称圜丘。明清北京城称天坛。其始建年代是西周早期的。西周中晚期又成为墓地。墓地中两座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表明其身份应是诸侯。考古发现证实先秦时期诸侯大墓一般都埋在都城之内，或都城附近。证明陈庄遗址应是齐国都城营丘。M18出土鬲器，是器主为“祖甲齐公”铸作祭器。

豐即齐乙公得，名得字豐。豐的祖父“齐公”即齐国始封君齐太公师尚父。是首见于金文的重要发现。其日名为甲，可补经籍记载阙佚。甲字形大墓 M35 出土的 70 余字的申簋，称为引簋是错的。“申”即齐献公山。铭文中的其父“幽公”即癸公慈母。《世本》作廋公。铭文中的“同陟追”，“陟”从市声，即五年师旅簋“羞追于齐”的师旅。“同陟追”与师旅“羞追于齐”，是同一次战争，即追捕齐哀公的战争。墓地中甲字形大墓 M36，只出土两件制作粗劣而且没有铭文的铜簋，应是被周王烹杀的齐哀公之墓。陈庄西周遗址的发现，对重写齐国西周史具有重要意义。

8.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出土有铭铜器数量之多，年代之早，是以往所仅见。学界几乎一边倒的认定属于“殷遗民”，或认为属于夏裔姒姓。我则论定其族属应是姬姓周人。此后又经过随州文峰塔春秋墓出土的曾侯與编钟铭文的释读，进一步论定随州曾国是辅佐文王、武王的开国元勋南宫括后裔的封国。叶家山曾国墓地族属是姬姓周人的看法，基本上可以定论。

9. 原称“栾书缶”的铜器实应改名为“栾盈缶”。栾盈缶是晋人“鞞栾氏”事件中，栾盈逃亡于楚时所铸造的铜器。

10. 山东多次出土春秋早期江汉地区诸国铜器。如上曾太子鼎、陈乐君欽甗、黄太子伯克盆、陈大丧史中高铃钟等等。最近沂水又出土邛（江）繁君孟、日照出土樊君千鼎，都应是齐桓公伐楚战争所掠夺的战利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观点有所改变，或由于新材料的发现对原说有所补充者，均在校注中加以说明。

以上所举各篇，都是本书中的重点。其主要收获，突出显示了考古发现对于证史、补史和纠正史籍记载失误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当然，本书所论，仅是作者的初步看法，还有待于补充与深化。不当之处，尚请方家、读者不吝教正。

目 录

序	1
---------	---

—

概述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	1
殷代长铭铜器宰甫卣的再发现	18
“成周”与西周铜器断代 ——兼说何尊与康王迁都	21
沔西发掘与武王克商	38
西周王年的调整	46
读《西周金文年代辨证》	51
东周齐国铜器的分期与年代	53
“右里”二量真伪辨	78
吴王夫差剑及其辨伪	82
晋公盘辨伪	86
颍公簋不伪	94

—

释𠄎(自)、𠄎(官)、𠄎(师)	96
释𠄎(自)、𠄎(官)、𠄎(师)补证	102
释匕、氏、示	107
释易	117
释𠄎、𠄎、𠄎 ——兼说𠄎、𠄎字形	125

曾侯與编钟释读订补	132
-----------------	-----

三

陕西岐山新出薛器考释	139
“多子族”复合族徽举例	147
《金文编·附录》中所见的复合族徽	160
周人族徽与先周文化（提纲）	197
根津三盃与中、蜻族徽	202

四

辉县赵固刻纹鉴图说	205
山东商周青铜器与山东古史	220
湖南出土商周铜器与殷人南迁	229
从考古材料看楚灭杞国	245
兖州剡器调查	
——兼说鲁分殷民六族的来源	255
新泰杞国铜器与商代杞国	
——全国首届杞文化研讨会学术报告	261
长岛战国铜器与“迁康公于海上”	268
纪、甯、莱为一国说	270
再说纪、甯、莱为一国	283
三说纪、甯、莱为一国	292
从曲阜两周墓看鲁文化面貌及楚文化对鲁国的影响	301
滕国考	308
邾器与邾国	314
小邾不小，邾分多国	
——《小邾国文化·序》	322
临淄国子墓和郎家墓的年代与墓主问题	325
国子鼎的年代商榷	332
莒公孙潮子钟考释与臧家庄墓年代	
——兼说齐官印“阳都邑”巨玺及其辨伪	334

郤氏戈的年代与国别	341
跋唐县新出归父敦	348
“二王并立”与虢国墓地年代上限	
——兼论一号、九号大墓即虢公忌墓与虢仲林父墓	353
上曾太子鼎的国别及其相关问题	362
跋陈乐君欽甗与耶孟	
——兼说齐桓公伐楚	368
河南固始“勾吴夫人墓”与番子成周钟	
——兼论番国地理位置及吴伐楚路线	376
荆公孙敦的国别与年代	383
《商周青铜兵器》读后记	387
跋楚国兵器王子反戈	393
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	396
鹿邑微子墓补证	
——兼释相侯与子口寻（膺）	404
微子墓论证侧记	417
晋侯苏钟与周宣王伐鲁	421
再说晋侯苏钟年代	
——兼论《中国先秦史历表》的校正	425
西周制度与晋侯墓地复原	
——晋侯墓地铜器铭文简释	431
山东高青陈庄西周城址是齐国都城	
——《济南日报》记者专访	443
高青陈庄西周遗址与齐都营丘	449
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笔谈	455
高青新出申簋考释	
——兼说高青陈庄齐国公室墓地的年代与墓主	457
高青陈庄重大考古发现补证与答疑	
——高青新出申簋释读商榷	464
华孟子鼎考释	475
邛簋君孟考释	477
枣庄峰城宋公鼎与睟公鼎	479
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	483

概述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山东各地陆续出土了不少商周青铜器。现择要介绍如后，并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以供研究参考。

一 商 代

根据我省目前调查资料，除个别地区外，其他各地区都分布有商代遗址。发现商代铜器的地点也几乎遍布全省，仅新中国成立后发现商代铜器的地点，就有烟台地区的海阳尚都村^①、惠民地区的滨县兰家村^②、昌潍地区的益都苏埠屯^③、淄博市临淄区的褚家、济南市东郊大辛庄^④、泰安地区的长清小屯^⑤、济宁地区的滕县井亭^⑥等。近年来，济南、邹县、滕县等地又有新的发现。

济南东郊大辛庄于 1970 年 12 月发现一批商代铜器，计有罍 1、觚 1、盃 1、戈 2、刀 1，共 6 件。

罍 高 23.3 厘米，平底微凸，足剖面呈形，腹饰云纹组成的饕餮纹图案，无云雷纹地。

觚 高 18.3 厘米，体矮，壁薄，足有“十”字镂孔，饰粗线条饕餮纹，无云雷纹地。

盃 高 10.4 厘米，球腹，尖足，素面。

① 《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 年。

② 《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 年，又见《惠民专区几处古代文化遗址》，《文物》1960 年 3 期。

③ 《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 年，又见《惠民专区几处古代文化遗址》，《文物》1960 年 3 期。

④ 《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 年 4 期。

⑤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64 年 4 期。

⑥ 《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 年。

戈 一件长 27.6 厘米，曲内，饰云纹，内和脊各有一穿。另一件长 19.3 厘米，直内。

刀 锋、柄均残，残长 23.7 厘米，柄有歧冠，饰云纹。

过去山东出土的商代铜器，多属殷墟文化晚期，大辛庄这组铜器的特点与安阳小屯 M331 相近，应属殷墟文化早期^①，这在山东还是第一次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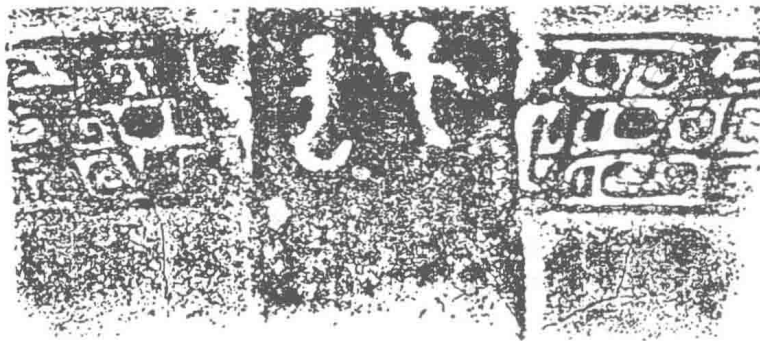
1971 年 4 月，在邹县化肥厂基建工程中，出土了一批商代晚期铜器，有觚、爵、戈、削、弓形器等 6 件，共存的尚有 10 件陶器，是一座商代晚期的墓葬。

其中，觚高 22 厘米，腹饰饕餮纹和圆圈纹，足内有铭文（图一）。爵高 23.2 厘米，牛首鋈，腹饰饕餮纹，鋈内有铭文（图二）。觚与爵的铭文均为氏族族徽，未见著录。

1964 年 11 月，在滕县姜屯公社种寨村发现了两件铜器，一件是饕餮纹鼎，高 21.1 厘米，立耳，分裆，柱足。另一件是鬲，高 18.8 厘米，立耳，分裆，颈饰饕餮纹，云雷纹地，口沿内有铭文 3 字，作“𠄎𠄎子”（图三）。𠄎字，系氏族名，此字应是“眉”字。金文“眉”有作𠄎（虢伯簋）、作𠄎（小臣諲簋），与此形近。汉字造字规律中有一种叫作“指事”，即用在象形字上强调某一点的办法来表示该字的含义，如在“刀”字上加一点，即成“刃”字。“眉”字的造字就是属于这种“指事”规律的。在“目”字上眉的部位加上一一点，意思就是告诉人们“眉在这里”。本铭“眉”字的发现，给指事规律增加了一个例证。



图一 铜觚铭文



图二 铜爵铭文



图三 铜鬲铭文

① 《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1964 年 4 期。

古都邑名可增邑旁，眉也作郿，郿通微。春秋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郿”。公羊、谷梁均作“冬筑微”可证。过去关于郿的方位众说纷纭，高士奇说：“《水经·济水注》引京相璠说，‘在寿张县西北三十里有微乡’，……今寿张县东南五十里。”^①有的则认为在东平西^②，更有的认为在聊城^③。罗泌《路史·国名纪》（卷四）同意《太平寰宇记》的说法，认为在潞东北（今山西长治市东北附近），而批驳微在鲁之微山一带的说法为非。现在这件“眉”器恰好出在距微山不远的地方，这对于寻找郿的位置提出了新的线索。

山东省博物馆于1965年和1966年两次在益都苏埠屯发掘了两座商代大型墓、两座中型墓和一座车马坑。其中一号大墓所发现的两件铜钺形体巨大，造型奇特，作透雕人面状，是两件罕见的珍品^④。《史记·鲁周公世家》有“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的记载，而苏埠屯的两件铜钺恰是一大一小，证明司马迁的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同时也给“王”字起源于钺的说法^⑤增加一项物证。这两把大型铜钺一是用作王权的象征，另外从刃部都有使用过的缺口来看，也无疑是杀伐奴隶和军事俘虏的刑具。其中的一件铜钺上正反两面铸有4个𣎵字，系氏族族徽，此字屡见于著录，郭沫若同志曾有考证^⑥。这个氏族的地望，由于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出土过两批铜器，已见端倪^⑦，我们这两次发掘进一步肯定了该氏族的墓地就在苏埠屯。在二号大墓的墓室四角，各殉有1人头和1盾、1戈。最大的一件铜戈长41厘米，内作精雕镂孔，内尾有歧冠。另外还发现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商代车马器。特别是这里发现的大量人殉，是目前所知安阳以外商代墓葬中殉人最多的一处。新中国成立前在安阳殷墟共发掘商代大墓11座^⑧，全部资料和珍贵文物均被劫往台湾。苏埠屯商代大墓的发掘，为研究我国商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 西周早期

文献记载，随着武王伐纣和周初平息五国之乱的胜利，周王朝的统治势力进入山

① 《春秋地名考略》卷2。

② 《春秋地理考实》引《春秋传说汇纂》，《皇清经解》卷252。

③ 《路史·国名纪》卷4引《十道志》

④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123页。

⑤ 《说“王”》，《考古》1965年6期。

⑥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卷一，科学出版社，1961年。

⑦ 《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

⑧ 《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东，并建立了以鲁、曹、齐为代表的一些姬姓和姜姓的国家以加强对商族的统治^①。过去山东出土的西周铜器，除黄县鲁家沟一批外^②，可以确定为西周早期的很少，而黄县归城发现的两批铜器，都是属于西周早期的。

1. 黄县归城小刘庄 1969 年在这里出土一批铜器，有卣 1、尊 1、盃盖 1、觶 1。除觶外其余 3 件均有铭文。

启卣 通高 22.7 厘米。兽首提梁，腹、盖均饰一条波形纹带，云雷纹地。腹部带纹中间饰突起的兽面。铭文 5 行 37 字，尾书族徽 2 字，共 39 字。器、盖对铭。铭作：

王出獸（狩）南土，𡗗遯山谷，至于上侯澆川上，启从征董不憂，乍且丁宝旅鬯彝，用勾鲁福，用飢夜事。戊觶。（图四）

𡗗，孟鼎畏字作𡗗与此形近，惟不从宀。孙诒让说畏应读如威。这里有征伐的意思。上侯、澆川均为地名。上侯曾见于师觶鼎^③。“用飢夜事”是周代成语，也见于伯晨鼎，作“飢夜用事”（师觶殷），也可省作“用事”（舀壶）。“用飢夜事”是朝夕服务于周王朝的意思。“戊觶”两字族徽，曾见于著录。

启尊 高 18 厘米。颈部饰波纹带，云雷纹地，纹带中间饰有凸起的兽面。底铸铭 3 行 19 字，尾书族徽 2 字，共 21 字。铭作：

启从王南征，遯山谷，在澆水上，启乍且丁旅宝彝。戊觶（图五）。

遯应是启卣中遯字的异体。澆，《玉篇》曰：“水文。”澆水，为水名。



图四 启卣铭文及纹饰

1. 器内铭文 2. 盖内铭文 3. 器身纹饰

① 《史记》：《鲁周公世家》《曹叔世家》《齐太公世家》。

② 清光绪二十二年，黄县鲁家沟曾出一批铜器，有钟 3、鼎 2、壶 2、盘、甗、盃、觶各 1，其中 4 件有铭文。尤以遇甗为最重要，《贞松堂集古遗文》《两周金文辞大系》《海外吉金图录》《吉金文录》《周金文存》《山东金文集存》《黄县志稿》等书均有著录。据遇甗器形及其他各器铭文书体，知系西周早中期作品。

③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 4，18 页下。

启卣 饰饕餮纹，铭作“𠂤父辛”3字（图六）。

觶 高11厘米。腹饰饕餮纹。

启卣和启尊的纹饰与书体均相近，应为同时所铸。启卣的“王出獸（狩）南土”与启尊的“王南征”是一个意思。“南土”即猷駮簋的“楚荆”，過伯簋和壘簋的“荆”。“王南征”即周昭王对南方楚国的征伐。《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初学记（七）》引《古本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启卣和启尊的形制、书体，以及花纹用云雷纹为地等，都是周代早期的风格，所记载的内容，又与昭王南征有关，其年代应订为昭王后期。启卣、启尊的发现为昭王时代铜器增加了两件标准器物。

“昭王南征”据历史记载是以战败而告终的。启器出土于黄县，启应是侥幸得以免遭灭顶之灾的逃归者。关于这次战争的起因，有人认为是由于楚国的强大“逐渐不顺眼而引起昭王的南征”。战争的性质是“带游观性质的”。“周王这种出征，一方面为了侵略，一方面为了游赏”。

唯物史观认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①。因此，我们不能从“不顺眼”，“特别喜好这种侵略战争”等一些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我们认为昭王南征的根本原因是物质利益的驱使，正如恩格斯所说，是由于“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食欲，获得财富已成为他们的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②。因此，对于周昭王说来，第一是掠夺，第二还是掠夺。跟随昭王南征的将士们毫不掩饰其掠夺的目的，而且予以夸耀和颂扬，说他们在这次南征中“孚（俘）金”（過伯簋），“有得”（猷駮簋），“孚（俘）”（壘簋）。封建士大夫阶级的那种“带游观性质”的闲情逸致，这时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2. 黄县归城姜家 1965年春，黄县归城姜家在修水库时发现一批铜器，有鼎2、



图五 启尊铭文



图六 启卣铭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三卷，43页。

②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5年，158页。

尊 1、卣 1、爵 2、甗 1、壶 1、觶 1、缶 1。共存的尚有玉戈、陶罐等。

鼎 高 27.6 厘米。立耳，垂腹，柱足。腹饰涡纹，云雷纹地。另一件形制相同，高 20.8 厘米，腹饰饕餮纹带。

尊 高 18.5 厘米。腹饰饕餮纹。铭文“乍父辛宝□”，下面字迹为铜锈所掩。

卣 高 22.2 厘米。盖、腹饰夔龙纹带及小兽面。蝉纹梁，端有羊首。铭文“乍宝尊彝”，器、盖对铭。

爵 2 件。分别高 21.8、22.3 厘米。腹饰两条弦纹。

甗 高 41.4 厘米。立耳，三足，活算。口沿下饰饕餮纹带，云雷纹地。

贯耳壶 高 45 厘米。体瘦高。盖的子口甚高，倒置可为杯。贯耳，盖、足各有两穿以与贯耳相对应，用以系绳。盖及颈部饰夔凤纹，云雷纹为地。据清理，系一座墓葬。

这批遗物的风格，与长安普渡村长由墓相近^①，应定为西周穆王时期。胶东地区一般认为系周人势力所未及的莱夷地区，归城小刘庄和姜家这两批铜器的发现，证明至少在昭王末期和穆王时代，周人的统治势力已经到达了胶东地区的黄县，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三 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

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山东除了齐、鲁两个大国之外，见于经传的中小国家是很多的，如邾、小邾、滕、薛、郯、莒、祝、郕、鄆、纪、杞、介、谭、郕、偃阳、宿。其他尚有任、向、牟、肥、胙、茅、郛、费、阳、鄆、须句、遂、郛、郕、颛臾等附庸小国。另外晋、卫、宋等国也有一部分领土伸入山东境内。可以说这个时期山东是一个城邦林立的局面。近年来，山东各地出土了多批这一时期的铜器。据不完全统计，有临淄的河崖头，曲阜北关，肥城小王庄，莒县天井汪，蒙阴岱崮，临沂花园公社，费县台子沟，平邑城子，五莲刘村，黄县南埠，烟台上夼，济南仲宫等 10 余批，总数约 150 多件。这些铜器对于研究山东这一时期各国历史，确定各国地理方位，了解各国铜器风格，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1. 临淄河崖头村 河崖头村位于临淄齐故城大城东北角。1965 年，在村东的淄河岸边发现了盂、簋、钟等铜器。其中铜盂高 43.5、口径 62 厘米，是近年来山东所出铜器中最大的一件。腹有两个杵形把手（失一），腹饰波状纹和窃曲纹。簋 4 件，双耳，方座（已残），饰波状纹。这批铜器系出于窖藏。

^① 《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 年 1 期。

1964年到1966年，我们曾在河崖头一带进行过调查发掘工作，发现了30多座春秋时代的墓葬，清理了其中的4座。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座石椁大墓的周围发现有殉马坑，仅清理了北面的一边，即有54米长，发现殉马145匹之多。根据墓葬规模之大，以及殉马数量的惊人，再参照《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氏侧庄公于北郭”的记载，春秋时代齐国的最高统治者的墓地可能就在河崖头一带。河崖头发现的这批铜器，应该是与祭祀齐侯墓有关，可能因为战争，更可能是由于政变的原因而埋藏起来的。

2. 曲阜北关 在今曲阜县城城外近西北城角处的护城河北岸。1969年秋，北关大队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批铜器，有簋6、豆2、车害1、铜铃6。经清理知系一座墓葬，早年曾被盗扰。上述遗物放置在未被扰动的西南角二层台上。

簋 高21.8厘米。双兽耳，有珥，三足。盖饰夔纹，腹饰窃曲纹和瓦纹，足饰垂鳞纹。

豆 高26.3厘米。盖有三禽钮，通体饰夔纹，足为镂孔。

传世鲁国铜器不多，可以确定系鲁故城出土的仅1932年在林前村出土的一批鲁大司徒元器^①，这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曲阜第一次发现鲁国铜器。

3. 烟台上夼村 上夼村位于烟台市南郊，1969年11月，在这里发现了一批铜器，有鼎2、壶2、匜1、甬钟1、戈2、鱼钩1。同时出土的尚有鬲、豆、罐、簋等陶器30余件。据调查系墓葬中所出。

冥侯鼎 高20.4厘米。立耳，蹄足，腹饰重环纹一周，底及足均有修补痕和烟熏痕，系使用器。铭4行22字（重文二字），铸于器内壁。文作“冥侯易（赐）弟叟鬲，弟叟乍宝鼎，其万年子_孙永保用”（图七）。《集韵》：冥，古国名。郭沫若同志认为冥国即纪国^②。也有人认为冥非纪，而是不见于经传的小国^③。冥侯，即冥国的最高统治者，亦称作“冥公”（冥



图七 冥侯鼎铭文

① 《山东金文集存》。另外，《故宫博物院藏品资料选介》（《文物》1966年5期封底）和《殷周青铜器通论》所著录之“鲁大司徒铺”，也应该是1932年林前村同一次所出。

②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199页。

③ 《黄县冥器》，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65~74页。